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 苏轼传播与接受

陈庆

摘要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关键词 当代韩国;朝鲜时代;苏轼;赤壁船游

中图分类号 I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1-0055-10

基金项目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HNSK(ZDZX)23-08]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1392年,李成桂取代王氏高丽而建立朝鲜王朝,到15世纪中叶,其国土大体定型,约相当于当今朝鲜和韩国的总和。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自太宗李芳远至高宗李熙,历代国王均接受中国皇帝册封;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再称臣于中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朝鲜王朝灭亡,共历27代君主、519年。“当代韩国”,则始于结束日本侵占的1945年。

苏轼自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开始受到关注,至高丽中期,“东坡热”席卷文坛,苏轼的文章成为主要的学习、模仿对象,鼎盛时期呈现“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须离其手”^[1](P515)的景象。朝鲜时代,苏轼的影响力虽有所减弱,但仍居于中国古代文学家前列。21世纪以前,当代韩国学者的苏轼研究论著不足百篇(部),讨论主要集中在苏轼的诗、词、文章、文论等方面,苏轼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关注重点。21世纪以来,韩国学者的苏轼研究日渐兴盛,截至2022年底,就有百余位学者发表近400篇(部)论著,研究重点也有所变化,苏轼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逐渐成为关注度最高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成果尤为丰富。据粗略统计,当代韩国学者的李白研究论著约200篇(部)、杜甫约300篇(部)、韩愈约200篇(部)、柳宗元约100篇(部)、欧阳修约300篇(部)等,比较而言,对苏轼的研究无疑是成果最为丰富的。

对于当代韩国学者的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研究,已有两篇论文予以关注,中国和韩国学者各一篇。韩国学者曹圭百《“高丽朝鲜时代的苏东坡接受”相关研究概况——以1964-2015年为中心》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将韩中学者(以韩国学者为主)的研究成果分为版本研究、韩国汉文学接受研究、高丽时代文人的接受研究、朝鲜时代文人的接受研究四个部分,在排比论文篇目的基础上就上述内容依次作了

介绍^[2](P231-256)。中国学者阮怡《苏轼诗歌在韩国传播接受的研究现状及其考察》的做法与之相近,虽然主题分类有所不同;所涉及论著截止于2014年,最近若干年的进展仍付阙如^[3](P19-27)。

本文以韩国学者在韩国本土发表的论著^①为主要讨论对象,重点不是研究成果的平面罗列,而是在对当代韩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展开历时态梳理的基础上,努力揭示不同阶段的学术特点,并就其学术前缘、学术贡献和学术前景作出分析和判断,史的线索更为清晰,论的意味更为鲜明。所观照的时段更长,所涉及的论著数量多出60余篇(部)。

一、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

在以儒学作为建国理念的朝鲜王朝,苏轼因其高丽观和被认为沉溺于佛、道,不时遭到朝鲜大儒的批评。如柳希春(1513-1577)曾在宣祖李昖(1567-1608在位)前评价苏轼“为人,矜豪诡譎,心术不正,发于文词,亦皆不平。是故芮晔掌学校之政,朱子遗书论曰:‘苏氏以雄深繁妙之文,扇其倾危变幻之习,以故人之被其毒者,沦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正当拔本塞源,庶乎可以障狂澜”^[4](P116)。金允植(1835-1922)这样评论苏轼所撰的《论高丽买书利害劄子》:“子瞻用意精悍,善揣人隐情。独于高丽事,猜之太深而防之太严。是徒知夷狄之难信,而不闻东方有君子之国者欤。……子瞻反欲绝其自来之使,岂为国深筹者耶。甚矣东人之爱华也。见绝如此,犹复诵其诗、慕其人而无怨怒之心。……噫,子瞻小人哉”^[5](P502-503)。尽管如此,苏轼出色的文学才能、豁达的人生观仍得到众多朝鲜文人的推崇。徐居正(1420-1488)在《四佳诗集·苏仙赤壁图》中喝彩说:“先生气节凌宇宙,先生文章焕星斗。追忆先生四百年,赤壁风月还依然。我今为赋赤壁诗,欲唤先生酌一卮。”^[6](P106)这是对苏轼人格和才情的热情礼赞。许筠(1569-1618)称赞苏轼的散文“变化无穷,人不测其妙者,亦千年以来绝调”^[7](P247-248)。不仅如此,世宗李裲(1418-1450在位)、显宗李柁(1659-1674年在位)、正祖李祘(1776-1800在位)等朝鲜时代君王都对苏轼及其文章青睐有加,例如正祖在位时推行文体改革,推崇苏轼以对策为主体的奏议文和具有政论性质的论辩文,将其作为范文推广^②。这些富于戏剧意味的文学场景,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赵承观1964年发表在东国大学《国语国文学论文集》第5辑上的《韩国文学中的苏轼》,该文分别考察了苏轼对高丽和朝鲜时代汉文学以及朝鲜时代韩文文学的影响,对相关作家作品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赵承观指出,苏轼在韩国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的表率作用极为巨大,虽然中国历代名家的诗文对韩国文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像苏轼那样为韩国文学家所广泛崇拜,并且形成韩国化文学景观的情形则十分罕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李昌龙、孙八洲分别探讨了朝鲜时代文人李滉(1501-1570)、申纬(1769-1845)对苏轼的接受,其视线聚焦于朝鲜时代个体文人,而非文人群体对苏轼诗文的接受,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之后,《中国语文学》在1985年第10辑和1986年第11辑中专设《苏轼特辑》,并于1986年第12辑和1988年第14辑中分别刊发尹浩镇的《韩国汉文学对东坡的接受》以及许捲洙的《苏东坡诗文在韩国的接受》,形成了韩国苏轼研究的小高潮。1993年成元庆的《松江文学中的东坡影响考——以〈关东别曲〉及〈赤壁赋〉为中心》聚焦于单篇作品,从生活经历、作品内容以及文学思想等方面着手,追溯了朝鲜时代诗人郑澈(号松江,1536-1593)《关东别曲》与苏轼《赤壁赋》的渊源关系。

21世纪最初十年间,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呈逐渐上升的趋势。2000年洪瑀钦发表《韩

① 本文主要对1945-2022年间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苏轼研究成果加以考察,所涉及的论著包括期刊论文和著作(不包括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刊登的篇幅过短文章未纳入统计范围。

② 1781年(正祖五年)奎章阁刊行的《唐宋八子百选》,收录了由正祖亲自挑选的100篇文章,其中苏轼所作20篇,占全书五分之一,包括《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代滕甫辩乞郡书》《思治论》《范增论》《倡勇策》《六一居士集序》《钱塘湖上人诗集序》《醉白堂记》《墨君堂记》《眉州远景楼记》《石钟山记》《赤壁赋》《传神》《潮州韩文公庙碑》等名作。

国苏轼研究述略》一文,这是韩国学者最早向中国大陆学界介绍苏轼在韩国传播与接受概况的论文,该文用大量篇幅对朝鲜时代前、中、后期文坛接受苏轼文学影响的情况作了分疏。此后,韩国本土发表的论著更多集中在苏轼对朝鲜时代学者的影响,而非朝鲜时代文人群体对苏轼诗文的接受方面。2004年金相洪的《茶山之苏东坡论》发表,该文考察了有20首和苏诗流传于世的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对苏轼的褒扬及批评,指出丁若镛一方面对苏轼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颇为推崇,另一方面对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等篇中提出的高丽论表示质疑和批评。2009年金甲起发表《紫霞申纬的诗学——与由苏人杜论相关联》一文,分析了申纬诗学的发展过程,即《申紫霞诗集·年谱》中记载的“公于诗始学盛唐,后改学苏东坡,悉弃前作。编诗自四十三岁辛未始。取翁覃溪所书赠堂扁之名,题为警修堂集”^[8](P9a),认为申纬的诗学理论在与翁方纲交往前就已发生转变。这十年间,虽有学者尝试研究苏轼对朝鲜时代个体文人的影响,但未能形成体系和规模。

2010年至今,无论是参与研究的学者数量,还是论著发表的数量,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都达到一个新的高点:南勇振(남영진)^①、吴洙亨、金保京、李泰熙、田嘉兰(전가람)、金光载(김광재)、崔日映、朴晟惠、张真焜、具本炫等学者发表多篇成果,分别探讨了苏轼对朴永辅(1808-?)、李祜(1752-1800)、曹兢燮(1873-1933)、赵龟命(1693-1737)、赵熙龙(1789-1866)、沈鲁崇(1762-1837)、申靖夏(1680-1715)、金正喜(1786-1856)、沈象奎(1766-1838)、李滉等的影响。

在上述学者中,其成果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曹圭百和柳素真,他们分别就朝鲜时代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所受苏轼的影响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2016年曹圭百出版《苏东坡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一书,柳种睦称之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认为该书不仅总结了韩国苏轼接受研究的现有成果,还发掘了许多新材料,为韩国汉文学研究以及苏轼文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该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高丽、朝鲜时代文人对苏轼的接受态度,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如第三章探讨了高丽、朝鲜时代的汉诗文思潮,并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解释了朝鲜时代文人推崇苏轼的原因。他特别提到科举的影响,引用了许实(1583-1625)《苏文抄·跋文》的一段话:“余于科场之文未得径蹊,擿埴于冥途,长吟碧桃之句。一夕季父判书公袖出八大家中苏子瞻集,令余读之,且令余自择其所好。余谨受其教,沉潜累年,虽不知其文之大异于前,而连中三科,终至大捷,此其效也耶。……季父公守遂安时,刊出《苏文抄》,余尝病其繁多,今宰高兴,书籍鲜少,袖中所对惟苏文一帙而已。更加精抄拣得五十五首,物力绵薄,侵梓无策,偶得活字,岂天与其便耶。后生之用力于翰墨者,如得此书而读之烂熟,不但取青紫如拾地芥,文章闾奥一蹴可到矣。”^[9](P55a-56a)这样的例证,是鲜活而有说服力的。该书的另一特点在于将高丽、朝鲜时代文人对苏轼的评价和接受态度分为肯定评价、否定评价和中立评价三类进行讨论。通常研究者会对其研究对象抱有偏爱,很容易出现不够客观的评价,但曹圭百保持了中间立场,未偏向任何一方。如第六、七章,分别探讨了朝鲜文人对苏轼散文和诗的评价。他引用了申钦(1566-1628)的话:“病东坡者,以其用古事太多。比之钉短,此论亦宜矣。东坡之用古事,只患才之太多,出语天成而不自觉尔,奚可以此而尤之耶。”^[10](P337)也引用了丁若镛的话:“苏子瞻诗,句句用事,而有痕有迹。譬看不晓意味,必也左考右检,采其根本,然后仅通其义,所以为博士也”^[11](P453)。他对材料的选择并不受个人偏好所左右。

青年学者柳素真围绕朝鲜时代个体文人的苏轼接受展开研究,发表了《朝鲜中期文人申钦的苏轼观》《朝鲜文人徐居正对苏轼的接受》《丁若镛流配时期和苏诗所体现的心理机制》《朝鲜前期诗人李荇对苏轼的接受》《朝鲜后期文人赵熙龙对苏轼的推崇方式》《苏轼诗文对崔岙诗的影响研究》《海东朱子李滉的和苏诗》《李安讷之诗对苏轼诗文的接受》《姜希孟之诗对苏轼的接受模式考察》等系列论文。柳素真聚焦于朝鲜前中期文人,在她的讨论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申钦、李滉这两位性理学代表人物对苏轼的

① 韩国人除韩文姓名外,通常还有相对应的汉字名,本文对无法确定汉字名的韩国学者,使用音译法翻译其姓名,并将韩文姓名附在其后。

接受。苏轼在中国本土常遭理学家指责,北宋的程颐、程颢,南宋的朱熹,都对苏轼颇多非议,而在朝鲜时代,性理学代表人物申钦和李滉与许多高丽、朝鲜时代文人一样,乐于阅读苏轼的诗文。有着“海东朱子”之称的理学家李滉,不仅对苏轼的人格、才情不胜向慕,还把苏轼的诗当成重要的文化媒介,经常以和苏诗的方式与同时代的名流交往。李滉的追和诗122首,分别为朱熹30首、陶渊明22首、杜甫18首、苏轼14首、韩愈12首、邵雍8首、无名氏5首、黄庭坚3首、苏辙2首、宋濂2首,只和了1首的有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黄潜。这些人中,邵雍、朱熹、黄潜是理学家,陶渊明、杜甫、韩愈、苏轼等则以诗文见长。由此可见,李滉虽然是朝鲜时代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但他并不像程颐、程颢等中国理学家那样贬抑诗文,反倒极为尊崇。中韩两国理学家的这种差异,为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当一种观念、一种理论从一地旅行到另一地,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微妙差异,不免有所变化和调整。

在柳素真关注的朝鲜文人中,朝鲜后期丁若镛的苏轼接受也是较为典型的个案。丁若镛曾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批评苏轼对禅学的热衷:“苏东坡染于禅学,其病根往往见于其文。潮州韩文公庙碑,以孟子浩然之气,为河岳星辰之气,其言已不伦。况云幽则为鬼神,明则复为人,此阴用轮回之说也。高明之陷于异端,而终不回悟,何如是哉。”^[11](P305-306)尽管如此严厉地斥责苏轼的异端倾向,丁若镛仍孜孜不倦地阅读苏轼诗文,并创作了14题36首和苏诗,如《和东坡〈闻子由瘦〉》《和苏长公〈东坡八首〉》《菜花亭新成,权左衡适至,次韵东坡聊试老笔》《石林李礼卿(鲁和)月夜来访,次韵苏东坡定惠院月夜步出》等。丁若镛曾写道:“细和东坡谪里诗”^[11](P84),超过一半的和苏诗写于流放时期(1801-1818),获释返乡(1818-1836)后创作了余下作品,在他遭遇人生巨大挫折之时追和的是苏轼贬谪时期创作的《东坡八首》《闻子由瘦》等诗文。由此可见苏轼超越时代、国界和学术立场的人格魅力。

总体来看,关于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当代韩国学者成果丰硕,李昌龙、孙八洲、成元庆、金相洪、吴洙亨、曹圭百、柳素真等学者各有造诣。但也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其一,韩国学者在考察苏轼对朝鲜时代汉文学的整体影响时,主要关注苏轼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文艺理论方面仅略有涉及,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其二,概述较多,或以朝鲜文人典籍中出现的有关苏轼的评价文字为证,或以朝鲜文人借鉴、融合苏轼诗词所创作的作品为例,偏于苏轼的总体影响或总体评价,深入的专题分析较为缺乏;其三,近十年来,虽然在朝鲜时代个体文人的苏轼接受方面研究进展较大,但关注对象限于姜希孟(1424-1483)、李滉、申钦、金正喜、丁若镛等名家,朴趾源、许筠、宋时烈、李德懋等诸多作者仍在视野之外。

二、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和“赤壁船游”研究

苏轼作品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赤壁赋》,朝鲜时代的许多文学作品都与之相关,有汉诗、时调、歌辞等多种形式。“赤壁船游”也在朝鲜时代成为一种流行方式:那时的文人往往在七月既望或十月望日,相约泛舟江上,吟咏唱和。

朝鲜文人参与的“赤壁船游”等雅集盛会,包括宴游、品茗、饮酒、赋诗、作画等活动。作为对苏轼及《赤壁赋》的独特继承方式,他们一方面通过“赤壁船游”这一活动,体悟苏轼超脱的人生观以缓解内心的困顿,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同时代文人之间学术交流的纽带,希望在近于《赤壁赋》所展现的美好情景中,产生不朽的文字。朝鲜文人由此创作了诸多作品,如徐居正的“壬秋七望广津头,拟续前贤赤壁游。月色有情今夜好,江流无尽几时休。高歌长笛蛟应舞,妙句豪谈鬼自愁。俯仰英雄嗟渺渺,苏仙不独擅风流”^[12](P363)、朴闾(1479-1504)的“飘飘下水帆,一瞥杳无蒂。嗟我不比渠,局促过半世。今年无小恨,好事靡不济。或阴而或晴,胜绝俱一例。缅怀赤壁仙,宇宙了睥睨”^[13](P21)、李植(1584-1647)的“即风流文雅之盛,虽未敢觑前辈一斑。乃其江山光景之美,自不减黄冈之夕。斯固不可谓不遭也”^[14](P146)等。朝鲜时代的《赤壁赋》接受和“赤壁船游”雅集,构成了韩国历史文化的一道亮丽景观。

1975年金胜连(김성연)的《受东坡诗影响之作品考察——以〈赤壁赋〉为中心》首次论及苏轼《赤壁

赋》对朝鲜时代文人的影响,按时调、歌辞、内房歌辞等文体分类罗列了作家作品以及苏轼相关作品的出处。该文所考察的作品均以混用韩文和汉文的方式写成,或借鉴用词,或引用故事,其中受《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影响的作品占比接近一半。因同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韩国国文学一直是在汉文学的影响中形成的,直至1446年朝鲜世宗大王正式创制并颁布《训民正音》,韩国国文学才开始发生变化。歌辞这一体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涌现了郑澈、朴仁老(1561-1642)等诸多著名文人。也许是因为作者从事的是韩国国语国文方面的研究,该文对朝鲜时代更为丰富的汉诗并未加以探讨。

1993年成元庆将郑澈的歌辞作品《关东别曲》与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作了简略的对比,认为《关东别曲》与苏轼作品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结尾处以梦中结交道士并在梦中发问作答结束,而且乌鹊、鹤、神仙等意象的使用都极为一致,他们的生活经历、政治思想也颇为相似。成元庆所考察的《关东别曲》仍旧是以混用韩文和汉文的方式写成的作品。

2010年4月姜庆熙的《朝鲜时代东坡〈赤壁赋〉的接受——以赤壁船游及〈赤壁赋〉仿作为中心》发表,同年6月,金周淳发表《苏东坡〈赤壁赋〉对朝鲜汉诗的影响》一文。这两篇论文虽然都致力于朝鲜汉诗文的考察,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姜庆熙主要关注以苏轼《赤壁赋》为摹本的三篇仿作,一篇是申维翰(1681-1752)的《拟赤壁赋》,描绘了1742年洪景辅(1692-1745)与众友人在临津江“赤壁船游”的盛景;一篇是赵缙韩(1572-1631)于1620年创作的《赤壁赋》,该篇在描绘自然景观之余,发出“天之创赤壁,非为吴蜀也,为苏子也。安知今之有石壁,非为历代固国而威敌,只为先生一言而设也”^[15](P378)的感慨,表达了赵缙韩对自身文采的自负,以及朝鲜文人的文化自豪感;一篇是赵缙韩在1622年写作的《反赤壁赋》,对朝鲜文人争相模仿苏轼“赤壁船游”的现象表达了不满。

韩国学术论文中有少量是用中文写作的,比如金周淳的一篇。金氏是台湾师范大学毕业的博士。他对徐居正、李荇(1478-1534)、朴仁老、尹善道(1587-1671)、金锡胄(1634-1684)、洪世泰(1653-1725)等人创作的以赤壁为对象追忆苏轼赤壁船游的代表性诗文依次作了介绍,认为朝鲜时代最早的与《赤壁赋》相关的作品是徐居正的《七月既望有雨玩月怅然有作》。

2010年金在现(김재현)首次对韩中“赤壁”景观和赤壁图作了专题研究。由于《赤壁赋》的深远影响,朝鲜半岛河流或海边凡有峭壁的地方,人们常常将其命名为“赤壁”。金在现罗列了朝鲜时代安坚(生卒不详)等人所绘赤壁图,并实地考察了位于全罗北道和顺郡的“赤壁”、全罗北道扶安郡的“赤壁江”、忠清南道锦山郡的“赤壁江”等三地景观以及相关诗歌作品。此前学者论及苏轼《赤壁赋》对朝鲜文坛的影响,多围绕诗文进行阐释和解读,而对绘画等艺术领域涉及较少,金在现的论文,开启了一种新的尝试。

2012年姜庆熙在《东洋古典研究》第49辑上发表《〈赤壁图〉中展现的〈赤壁赋〉之形象和叙事——韩国与中国的〈赤壁图〉比较研究》一文,集中介绍了朝鲜时代文人的作品,如安坚《赤壁图》、金弘道(1745-?)《赤壁夜泛》、李在宽(1783-1837)《赤壁夜游》、赵荣祐(1686-1761)《船游图》等。与中国的《赤壁图》相比,现存朝鲜时代的作品大多是吴派小景山水画风格,说明朝鲜时代的《赤壁图》更关注船游中人的活动。原因在于,由《赤壁赋》衍生出的“赤壁船游”在朝鲜时代成为一种文化风尚,船游赏景并不是主要目的,留下不朽的文学作品才是,在这一过程中,相比空间背景,船上的人物行为更受瞩目。2013年李泰浩对最新公开的个人所藏郑澈(1676-1759)创作的《羽化登船》和《熊渊系缆》两幅作品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这两幅作品收录于《涟江壬戌帖》,是郑澈为1742年十月既望与洪景辅等人在临津江赤壁船游的活动而作。

“赤壁船游”作为朝鲜时代学苏慕苏风尚的表现方式之一,虽然在学术讨论中也多有提及,但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成果直至近十年才出现,其标志是2014年曹圭百发表的《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东坡前后〈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的重演》。通过考察朝鲜时代的诗文作品,曹圭百确认,“赤壁船游”代表场所有位于汉江的蚕头峰、广津、杨江,位于洛东江沿线安东的濯缨潭、尚州的擎天台,位于和顺同福

的赤壁、临津江的赤壁、锦江的夫余、济州的龙渊等,除此之外还有安东河回、大邱花园、盈德小赤壁等。曹圭百还将该篇论文收入他于2016年出版的《苏东坡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一书。

“赤壁船游”的诗文结集成册,比较著名的有《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这些诗文集也在最近几年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2019年曹圭百在《朝鲜时代汉文学中出现的苏东坡“赤壁船游”重演研究——以汉江圈为中心》一文中,集中考察了汉江流域的蚕头峰船游、广津船游以及杨江船游。选取这三处的理由在于,朝鲜时代代表文人徐居正、朴闇、李荇、李植等人在这类地方创作并留下了文学价值相对更高的作品。该文将数次赤壁船游诗作分“赤壁船游”的继承、“赤壁船游”创造性接受、“赤壁船游”重演的自我反映和文采风流的歌咏等三个部分作了介绍,相关诗作均为初次引用的文献。2021年曹圭百发表《朝鲜时代汉文学中出现的苏东坡“赤壁船游”重演研究——以〈壬戌泛月录〉为中心》一文,聚焦洛东江上举办的五次泛舟诗会,时间分别为1622年7月、1622年10月、1657年7月、1682年7月和1770年7月。这五次诗会,以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最为盛大,1622年7月共有23人参与,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下清徐来水”23个字为韵作诗;1770年7月共有57人参与,在这次船游活动中,参与者对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了创造性改编。2022年柳素真的《〈蚕头录〉中呈现的朝鲜文人之“赤壁船游”文化以及〈蚕头录〉的意义》发表。《蚕头录》收录了1502年七月既望和十月望日,朴闇、李荇、南衮(1471-1527)等人在蚕头峰下两次船游时创作的诗作。《蚕头录》的问世,不论是对同时代的文人,还是对后世文人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推进了“赤壁船游”在朝鲜时代文人中的普及。

总体来看,朝鲜时代的《赤壁赋》接受和“赤壁船游”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包括:《赤壁赋》对混用韩文和汉文创作的作品之影响;朝鲜时代汉文诗对《赤壁赋》的接受方式;朝鲜时代《赤壁图》及赤壁景观中展现的《赤壁赋》;朝鲜文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泛游“赤壁”的目的及意义。所有上述研究,均偏于个案的梳理、事实的描述,从学理上加以阐释的较少,深度有所欠缺。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没有一个韩国学者指出“赤壁船游”与《赤壁赋》误读的关联。朝鲜时代的“赤壁船游”风尚,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苏轼《赤壁赋》是一篇千古传诵的名作,朝鲜时代的文人学士对之崇拜之至,甚至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慕苏”“崇苏”的氛围弥漫在士大夫之间。洪奭周(1774-1842)曾在《鹤冈散笔》中写道:“赤壁二赋,脍炙千古。童孺妇女,皆能传诵。”^[16](P148)可见其流传之广。其二,朝鲜文人对苏轼《赤壁赋》作了创造性误读,把作品中的某些描写当成了完全真实的事情,且视之为作品的重心所在,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17](P5-6)从赋的传统来看,用对话方式结构文章是一种惯例,也就是在作品里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由他们展开对话,给作者的表达提供一个平台。在这种对话结构中,参与者有两人、三人甚至四人,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而设置,未必有事实依据。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18](P1113)苏轼《赤壁赋》中的“主”与“客”以及“主”“客”饮酒放歌的情形,也未必是真实的;即使是真实的,也不是文章的重点所在。但朝鲜时代的众多文人学士,则把“船游”当作了重点,并在生活中仿效,频频举行类似的雅集。朝鲜时代的《赤壁赋》误读以及由此形成的“赤壁船游”风尚,是跨文化交往中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韩国学者留意到这一误读,并与中国本土的相关接受情形加以对照,对于中韩文化的异同,一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三、朝鲜时代苏轼著述版本考证

苏轼作品自高丽时代传入韩国,时至今日,韩国所藏苏轼论著多为朝鲜刊本和中国明清刊本。其中

朝鲜刊本有：《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20册，宣祖年间（1567-1608）木板本；《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5卷2册，朝鲜木板本；《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28卷，朝鲜后期戊申字覆刻本；《苏东坡文抄》2卷2册，肃宗年间（1675-1720）芸阁笔书体字本；《苏文抄》3卷3册，光海8年（1616）木活字本；《苏文正宗》1册，明宗16年（1561）木板本；《东坡诗选》2卷2册，明宗20年（1565）木板本；《东坡诗注》1卷1册，朝鲜末期写本；《苏律分韵》1卷1册，朝鲜后期写本；《东坡源流》2册，朝鲜后期写本；《大宋眉山苏轼家传心学文集大全》52卷，中宗年间（1506-1544）金属活字本；《欧苏手简》4卷，太祖2年（1393）木板本；《欧苏手简抄选》1册，显宗15年（1674）木板本；《文史咀英》8卷4册，纯祖29年（1829）初铸整理字版；等等^①。

朝鲜刊本苏轼作品集一部分是中国刊本的覆刻本，一部分是经朝鲜文人重新编辑后出版的选集。在韩国，诗选集的编刊始于高丽后期，直至朝鲜时代才出现由朝鲜文人直接编选的中国诗选集。朝鲜本苏轼诗文集编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表明朝鲜时代汉文学界对于苏轼作品的阅读和理解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分析这些诗文集不同版本的内容和特征，可以了解苏轼作品在朝鲜时代的接受情形以及朝鲜文坛的动向。

1985年李义活整理了国会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首尔大学图书馆、高丽大学图书馆、延世大学图书馆、梨花女子大学图书馆、东国大学图书馆、成均馆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启明大学图书馆、庆北大学图书馆等韩国主要图书馆所藏苏轼著述及书帖的古书目录，该文为后续苏轼相关古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2000年由金学主编的《朝鲜时代刊行中国文学相关书籍研究》一书收录了金庠濬撰写的《朝鲜刊“苏诗文集”概况》，这是韩国当代学者较早研究朝鲜时代苏轼诗文集刊印版本的论文。通过对比奎章阁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日山文库本《增刊校正百家注东坡先生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诗集注》、四部丛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朝鲜时代刊行的几种主要苏轼诗集以及相关中国刊本，金庠濬发现：奎章阁本和日山文库本虽均以中国刊本为底本，但中国刊本中一些明显的刊刻错误在朝鲜本中并未出现，有一些注释只在朝鲜刊本中存在。

金郁林（김울림）于2004年发表的《翁方纲之金石考证学与苏东坡像》，是为数不多的以绘画为考证对象的论文。金郁林认为，东坡像的绘制和传播并非自宋代以来就持续存在，而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翁方纲的苏学复兴以及“东坡祭”需求背景下的集中展现。作者从李公麟《苏轼像》的文献记载出发，对赵孟頫《苏轼像》和《嵩阳帖》摹本肖像图、朱之蕃临本《东坡笠屐图》、王春坡临本《东坡笠屐图》、朱鹤年《东坡先生笠屐像》等依次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由于“东坡热”的影响，各种苏轼像在19世纪被介绍给朝鲜文人，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东坡笠屐图》，不少朝鲜文人都有临摹之作，如许炼（1809-1892）《苏长公笠屐像》。苏轼肖像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其原始细节已经逐渐淡化，但某些元素，如竹笠，逐渐被强化为一种人生境界的象征。因此，同时期的其他肖像画中也时常出现头戴竹笠、脚踏木屐的人物。

2009年至2011年唐润熙陆续发表了《朝鲜刊本苏轼诗集版本小考——以〈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为中心》《朝鲜刊本苏轼诗文集与文集版本小考》《朝鲜时代中国本诗文集流入、刊行及接受模式略考——以唐宋八大家为中心》等系列论文，2011年唐润熙还与吴洙亨合作发表了《唐宋八大家文选集在朝鲜时代的接受与流通——以韩国所藏唐宋八大家古文选集版本为中心》一文。《朝鲜刊本苏轼诗集版本小考——以〈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为中心》对朝鲜时代刊印的苏轼诗集主流版本，包括金属活字本、木活字本、木板本共71种，作了考察，其中《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68种，《东坡诗选》2种，《苏诗摘律》1种。韩国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为初铸甲寅字本，世宗16年（1434）刊印，已无完帙本；现存的木活字本大部分为甲寅字体训练都监字本，是壬辰倭乱（1592）之后朝鲜中期刊行的版本；现存的木板本是朝鲜中后期地方政府以金属活

^① 若同一本书有多个版本，这里只列出保存较为完整的版本信息。

字本或木活字本等中央政府排版印刷的版本为底本刊行的普及本。《朝鲜刊本苏轼诗文集与文集版本小考》一文首先对朝鲜时代刊印的苏轼诗文集金属活字本《苏文忠公集》甲辰字残本作了考察,甲辰字是成宗15年(1484)刻印的版本,从版本特征来看,以元代版本为底本制作的可能性极大;其次整理了朝鲜时代刊印的苏轼文集《宋大家苏文忠公抄》(《唐宋八大家文抄》本)、《苏东坡文抄》(《四大家掇英》本)、许实选本《苏文抄》及《东坡文萃》,其中后三种是朝鲜时代文人亲自编定而刊印的选本,《苏东坡文抄》为官刻本,许实编订的两种为私刻本。《朝鲜时代中国本诗文集流入、刊行及接受模式略考——以唐宋八大家为中心》一文则对朝鲜时代刊印的苏轼与他人的合集《唐宋四家文抄》《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子百选》《欧苏手简》《苏文正宗》《三苏文》等的版本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至少有三点重要发现:第一,朝鲜刊金属活字版作为官刻版本,被反复重刊,是朝鲜刊本中的主要版本;第二,朝鲜时代所编的苏轼选集偏重诗歌;第三,韩国现存的唐宋八大家诗文集集中有不少明清版本,表明朝鲜时代对引进这些新出的明清诗文集是持积极态度的。唐润熙、吴洙亨合著的《唐宋八大家文选集在朝鲜时代的接受与流通——以韩国所藏唐宋八大家古文选集版本为中心》一文对韩国所藏中国本《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大家文悬》《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唐宋八大家选集》《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等十种文章选集以及韩国所藏朝鲜刊本《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子百选》两种文章选集的版本情况作了梳理和探讨,其中《唐宋八子百选》是朝鲜正祖亲自编定的官刻本。

2011年洪瑞妍对四种现存的《苏诗摘律》版本作了考察,其中一种为中国本,三种为朝鲜本。中国明代天顺5年(1461)木板本《苏诗摘律》完帙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朝鲜时代金属活字本甲辰字本(中宗中后期)藏于韩国高丽大学和日本尊经阁,另两种朝鲜时代木板本完帙本分别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和日本国会图书馆。经过以上梳理,作者认为,《苏诗摘律》在朝鲜时代共刊行三次,并被广泛接受。随着韩国高丽大学和韩国学者黄瑄周个人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残本的发现,2012年洪瑞妍发表了《朝鲜刊本〈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文献考察》一文,所考察的三种现存《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均为朝鲜木板本。高丽大学的两种藏本分别为5卷2册和零本1册,黄瑄周个人藏本为3卷1册。洪瑞妍逐一比对了“桓”“匡”“玄”“宁”等避讳字和“归”“庐”“后”“刘”“齐”“弃”等简体字以及“觉”“学”“举”“归”“辞”等异体字的使用情形,确信这三个版本均是以中国元刊本为底本的覆刻本,《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在朝鲜时代共刊行三次以上。

2013年金甫暻发表《朝鲜本〈东坡诗选〉初探》一文,聚焦于由朝鲜前期文臣郑百朋构思,其侄子、朝鲜时代文人郑磁担任实际编纂及出版工作的《东坡诗选》一书。经由对朝鲜时代木板本《东坡诗选》原文、注释文字以及版式的分析,金甫暻确认,《东坡诗选》的原文和注释文字与朝鲜时代出版的刘辰翁批点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本最为接近,甚至错误都相同;两部书虽然纸张大小稍有差异,但版式整体相似。由此可知,朝鲜本《东坡诗选》是以朝鲜刊本刘辰翁批点本为底本而编成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朝鲜本《东坡诗选》删掉了底本中的“类名”和注家名,且对原诗题及注文有所删减。2016年金甫暻发表《朝鲜时代苏轼诗选集之考察》,对朝鲜刊《苏诗摘律》、朝鲜刊郑磁本《东坡诗选》、朝鲜刊柳希龄本《苏诗抄》、中国刊袁宏道、谭元春本《东坡诗选》、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抄本《苏诗(抄)》《东坡律》《坡诗英选》《东坡长篇》《霞选施注苏诗》、韩国高丽大学所藏抄本《东坡集选》《东坡诗抄》《东坡诗(选)》《东坡诗句抄》《东坡长句》等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虽未能涵盖朝鲜时代苏轼诗选集的所有版本,但为探讨朝鲜时代苏轼诗集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丰富史料。同年,金甫暻发表《袁宏道、谭元春选评本〈东坡诗选〉初探》一文,在第二节中对韩国所藏袁谭本《东坡诗选》的版本情况作了讨论。

2016年,曹圭百《苏东坡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一书的第二章,就苏轼诗文集在高丽、朝鲜时代的传入及刊行展开了讨论。曹圭百以高丽朝鲜时代文人诗文集、朝鲜时代各王朝实录中的记载、当代学者的相关著述等为依据,完成了苏轼文集在高丽、朝鲜时代的传入及刊行以及苏轼诗集在朝鲜时代的传入及刊行的概述,并不涉及具体版本信息的交代。2022年,吴友京(오유경)发表《云阁笔体字本〈四大家文

抄)的编排体系及影响研究——以朝鲜刊本唐宋八大家相关文选集为中心》一文。韩国所藏《四大家文抄》是收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作品的文章选集,仅有目录和正文,并无序跋文或刊记。通过比较四大家文抄与唐宋八大家文抄及相关文选书籍的作品编排和正文,作者认为《韩文抄》《柳文抄》与朝鲜中期文人柳梦寅(1559-1623)编纂的《大家文会》相关,《欧阳文抄》《苏东坡文抄》与洛东契字本《唐宋八大家文抄》相关。

综上所述,1985-2009年的20余年间,韩国学者对苏轼相关著述的朝鲜版本,仅李义活等偶有涉及;2009年后,以在中国大陆取得博士学位的唐润熙、金甫暲为主,韩国学者就此发表了系列论文,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够,留下的空白甚多,例如,除《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苏诗摘律》《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东坡诗选》《四大家文抄》等苏轼诗文集有专题讨论之外,《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苏文抄》《东坡诗选》《大宋眉山苏轼家传心学文集大全》等诗文集均未进入专题考察范围;朝鲜时代文人重新编纂完成的《唐宋八子百选》《文史咀英》《欧苏手简抄选》等文章选集与相关中国刊本存在显著差异,《欧苏手简》在中国已失传,其重要性更不言而喻,而韩国学者鲜少关注,除《唐宋八子百选》的版本考证有数篇论文略有涉及之外,《欧苏手简》《欧苏手简抄选》《文史咀英》的版本考证仅唐润熙的《欧阳修诗文集在朝鲜的接受与流通(2)——以韩国所藏朝鲜本欧阳修诗文集为中心》提及。

四、结论

本文主要考察了1945-2022年间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可大体分为三类: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朝鲜时代的《赤壁赋》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

关于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南勇振、吴洙亨、金保京、李泰熙、田嘉兰、金光载、崔日映、朴晟惠、张真焜、具本炫等学者发表了多篇成果。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的贡献较为突出,曹圭百主要研究朝鲜时代文人群体的苏轼接受,柳素真主要研究朝鲜时代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

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至2010年,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增长态势。苏轼的《赤壁赋》在朝鲜时代流传范围最广,朝鲜文人创作了诸多与之相关的仿作或唱和诗,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因“赤壁船游”而产生。金胜连、成元庆、姜庆熙、金周淳、曹圭白、柳素真等从不同角度深化了“赤壁”相关论题。

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主要学者有李义活、金郁林、唐润熙、洪瑞妍、金甫暲等,但总体而言,规模依然有限,可以拓展的余地较大。

参考文献

- [1] 李奎报. 东国李相国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 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 [2] 曹圭百.“高丽朝鲜时代的苏东坡接受”相关研究概况——以1964-2015年为中心. 中国学报,2015,73.
- [3] 阮怡. 苏轼诗歌在韩国传播接受的研究现状及其考察. 新国学,2019,(2).
- [4] 宣祖实录//李朝实录:第27册.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
- [5] 金允植. 云养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28册. 首尔:景仁文化社,2004.
- [6] 徐居正. 四佳诗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 首尔:景仁文化社,1988.
- [7] 许筠. 惺所覆瓿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 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
- [8] 申纬. 申紫霞诗集. 南通:翰墨林书局,1907.
- [9] 许实. 苏文抄. 首尔: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1616.
- [10] 申钦. 象村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2册. 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

- [11] 丁若鏞. 与犹堂全书//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8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
- [12] 徐居正. 四佳诗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88.
- [13] 朴闇. 挹翠轩遗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1册.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88.
- [14] 李植. 泽堂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8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2.
- [15] 赵缵韩. 玄洲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
- [16] 洪奭周. 渊泉全书.首尔:昨晟社,1984.
- [17] 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8]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Contemporary Korean Scholars' Study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Su Shi in the Joseon Dynasty

Chen Qing (H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Joseon era in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lasted for over five hundred years (1392-1910). Between 1945 and 2022, Korean scholars published works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Su Shi during the Joseon era, which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the study on the reception of Su Shi in Han-style literature during the Joseon era, the reception and research of Su Shi's *Odd to Red Cliff* and the "Boating at Red Cliff" during the Joseon era, and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Su Shi's writings during the Joseon era. The study on the reception of Su Shi in Han-style literature during the Joseon era, which began in 1964, reached its peak after 2010. Among the scholars, Cho Kyubaek and Liu Sojin have respectively focused on the reception of Su Shi among the literary community and the reception of Su Shi among individual literati,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The research on the reception of *Odd to Red Cliff* and the study of the "Boating at Red Cliff" began in 1975 and have gained momentum since 2010. Some significant poetic and literary collections, such as *Renxufanyuelu* and *Cantoulu* which emerged from the "Boating at Red Cliff", have also become important subjects of study. The collection of Su Shi's works that exist in South Korea is quite extensive, with the majority being printed during the Joseon era or directly imported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ce 1985, there have been sporadic occurrences of papers introducing versions or conducting textual research. After 2009,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chievements. However, a large-scale collective effort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and the research topics remain relatively dispersed.

Key words contemporary South Korea; Joseon dynasty; Su Shi; boating at Red Cliff

-
- 作者简介 陈庆,海南大学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研究员;海南海口 570228。
■ 责任编辑 何坤翁